

刘少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了。他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者之一，竟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康生、江青之流迫害致死。这次调查使我们活着的共产党人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建国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如何搞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都提出过很多很好的思想和主张。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少奇同志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感到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很有创造性的，作为历史的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加以回顾和总结。

一

民主革命的胜利，虽然为国家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严重的困难，不容许我们马上采取很多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还必须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那时，国民经济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所构成；国营经济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虽然是国家经济的所有制成分，但所占比重较小；个体经济比重较大；小私有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占很大比重。在这个阶段，如何正确地对待汪洋大海似的小私有经济，如何正确地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是建国初期指导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解决这个重大课题，少奇同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与资本家的斗争应主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争来进行。1948年9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斗争策略作了比老系统的论述后，说：“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个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输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也要失败。”他还指出，国营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0%到20%，正是因为这一部分数量较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这个”。他还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随后，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政治局会上讲的意见。对少奇同志的主张，毛主席表示完全赞同，还嘱托刘少奇同志对新中国的经济性质进一步思考和分析，写出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讨论。

他还主张组织供销合作社，在流通领域架起一座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桥梁，使千千万万生产者紧紧跟随无产阶级前进。他解释说：“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个最重要而最决定性的又最难实现的要求，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怎样去帮助、教育和组织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及爱他小生产者，使他们紧紧地跟随着自己前进。”他说：“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根据这些分析，他提出：“在革命胜利后应进行经济建设的最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广大的范围内组织消费合作社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组织这种供销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最有利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结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上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这里，我附带说明一下，在农村组织供销合作社，东北开始得比较早，但在这些新生事物，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基本上是支持的态度，但在某些具体做法上也是有不同的。比如，供销社是要赢利分红的，少奇同志是反对的，他认为分配应该是资本主性质质的。有一次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争论得很激烈，快到中午饭了，毛主席站起来，当着少奇、陈云同志的面，边走边说：“少奇同志，我不支持你的意见，我是支持你的。”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见当时党中央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和酝酿才决定行动方针的，党内具有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

少奇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主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集全党智慧之大成，明确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路线和政策。这些路线和相应的政策在建国初期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当时，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他对中国经济情况的了解和研究也比陈强得多，出的主意甚多。例如，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形式，扶植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既能增加供给，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又如开展城乡交流，允许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自由贸易，以价格政策指导农民，逐步缩小工业产品价格与“剪刀差”，这既能促进工农业生产，又能以商品交换这个农民乐于接受的办法，用工业品从农民手中换取粮食、棉花和其它农副产品，改善市场供应。由于正确处理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营企业同私营企业的关系，我们的政府有效地领导了全国城乡经济，迅速平抑了粮价，保证了城乡人民的需要，克服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粮食不足、商品匮乏等经济生活极端混乱的状态，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解放战争即进入了向全国胜利进军的阶段，军需物资的需要量急剧增加；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特别是大批中城市的相继解放，生活用品的供应也相当困难。这些都亟待我们去解决。而当时，官僚资本企业正在被接管，使之恢复正常生产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迅速恢复私营企业的生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1949年4月9日，我给毛主席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由于天津解放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他们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消极，有的甚至想外迁逃。同时，也有有些工人在对资斗争中，向资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在群众斗争的高潮中是难免的，但却增加了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据该市1949年2月15日的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经济秩序都为不利。对此，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很重视。少奇同志认为，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为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亲自到天津去考察。

4月初的一天，少奇同志来到华北局机关，对我说：“我向你来报到。”并告诉我，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我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同志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我，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有什么意见，我再向他转达此事。表现了

少奇同志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

少奇同志在天津，发现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后，许多同志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戒律甚多，不注意团结民族资本家，更谈不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而只片面强调同他们作“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少奇同志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天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他向工人讲：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利。在一次同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他还谈到：与封建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他还勉励一位把工厂办得不错的资本家多办几家工厂，多安置一些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有些言辞是不妥当的，但其根本用意，是想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我把少奇同志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太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删掉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我转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我们党实行“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少奇同志回京后，批评了东北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倾向。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极为不满，他不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去散布，并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少奇同志。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批评我在新民主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高岗借此“批萧划刘”，向党进攻。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批评萧一波划刘外，还有指责萧波划刘少奇同志的意思”。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说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当时对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所作的历史评价是公正客观的。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允许适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合法利润（即照章纳税，取得一定利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并没有错。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在民主主义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还指出，对资产阶级要区情况，实行不同政策，适当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要过早取消定息。要允许自由市场和私人工厂的继续存在。当谈到上海出现“地下工厂”时，他说：“地下工厂”虽然是国营经济的对立面，但由于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由地下变成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国营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缝，质量差，就应该允许开私营工厂、夫妻店同地上的作对。甚至允许开私营大厂，通过订合同，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开厂或搞投资公司，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这叫做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少奇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讲，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不怕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周恩来、陈云同志也都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个思想特别宝贵，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作用。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方针和总路线的。由高岗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虽然早已结束，而“剥削越多越好”这句不恰当地用语，却成了话柄，后来被林彪、康生、江青之流所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给少奇同志罗织罪名，口诛笔伐，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污蔑这句话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少奇同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三

中国革命胜利后，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这一点，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何时开始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我体会，最初，他们各自是有不同理解的。少奇同志主张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当然，少奇同志认为二者不是绝对分离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必须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他强调，“新民主主义要继续搞一个时期，短了不行”。他在一次报告中，甚至强调说，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基于这一认识，他对在农村办合作社大体是赞成的，但不同意过急。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不要怕农民“冒富”，只有80%的农户发展到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富裕程度后，才可由他们自愿地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少奇同志的这一基本思想，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示和其他一些谈话中。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提出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认为老解放区的互助组出现了向富农方向发展的问题，如果不注意纠正，将使互助组涣散解体，或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主张扶植和增强互助组内出现的“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逐步动摇和削弱私有制的基础，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少奇同志看了请示报告后，向华北局的同志表示：不能过早地轻易地采取动摇农民个体所有制的步骤。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场，这是生产方式上的一个革命，没有机械化和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是难以办到的。华北局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5月和4月，华北局批复山西省委，指出他们过早地“用积累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基础是否定私有制基础，是与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和《共同纲领》的精神

不相符合的”。6月29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未指名地对山西省委的这个意见提出了批评。7月3日，少奇同志也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书面批语，尖锐地指出，那种企图“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5日，他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讲述《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时，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思想。他认为，目前“在农村中既不是去阻止或企图避免农民的自发趋势，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强以领导，适当地控制和限制，准备最后的胜利”。

对一个省委提出的事关农业合作化大事的报告，少奇同志以个人名义提出批评，按党章是允许的，但事先没有征求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就进行批复，确实欠妥当。毛主席对这个做法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对比我们高明。他高瞻远瞩，看到了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所表现出的两种生产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这两种积极性他都珍惜和爱护。

起初，他对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估计是不够的，而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当听到一位农村作家不赞成互助合作而主张单干时，他就英明果断地肯定了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提出既要保护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个体单干的积极性，这两种积极性都要受到保护。毛主席从各地的互助合作实际经验中，发现了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方式——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他主持起草并由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肯定了这种初级社是走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的过渡形式。它既“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又“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既坚持了互助合作的方向，又照顾了农民小私有者的愿望和要求。实践证明，这个《决议》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后来偏离了这个《决议》的精神。

现在看来，少奇同志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把搞互助合作叫做“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也过份了，确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在一次讲话中也有过过分强调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的片面观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指出不要轻易动摇农民个体所有制的观点，则是正确的、及时的，并且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基本观点是被《决议》所采纳了的。土改后的老区农村，确实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即向富农发展的自发倾向和平均主义的倾向。防止两种分化确实是必要的，但过早地采取动摇或消灭农民个体所有制的办法是很不合时宜的。因为那样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急于那样做，其结果只能助长平均主义，损伤农民的积极性，把大家捆在一起受穷，反而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点，毋庸多言，已被后来的实践证明，已为人所体察到。至于少奇同志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某些片面性，一经毛主席指出，他不再坚持，心心悦服地接受毛主席的正确见解。这说明，在建国初期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确实是密切合作共事的伙伴，在一些问题上虽然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能够互相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后来，这种局面改变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也就不断发生。

四

1952年秋，恢复国民经济任务胜利完成。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并经党中央多次讨论，于1953年制定了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一个中间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来，这个总路线的提出，在当时是必要的、及时的和完全正确的，是富有远见的。同样，毛主席估计要用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像过桥那样一步一步地走，用逐渐过渡的办法完成三大改造的任务，也是完全正确的，富有远见卓识的。在这个总路线指引下，我们对社会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和组织起来的方式，在其长远上都是创举。如果按原定设想，真的扎扎实实搞十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过渡，不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在这样的建成就可能要得多，并且可以避过后来发生得很多偏差。当然，现在看来，要实现真正的而不是字面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十五年的时间是太短了，可能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

从1953年起，开始了规模宏伟的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建设。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少奇同志曾帮助他组织工业交通部负责同志的座谈会。通过座谈，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想法，例如，正确处理轻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和内陆的关系、工业建设中平时和战时的关系等。毛主席知道后很感兴趣，也要我协

助他组织这方面的汇报会。这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建设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调查研究活动。毛主席写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的结晶。

后来，由于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实际工作上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失误。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把群众所谓“小脚女人”走路，引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过早到来。

在反右倾保守的气氛下，其它各条战线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失误也相继发生。当时，周恩来、陈云同志针对这种倾向，及时提出反冒进，压缩开支，降低各项指标。少奇同志也是反对急躁冒进的。1956年2月17日，他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脑子太热，提的指标太高，没有条件做到，这就是冒进，要防止。同年6月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在听取了周恩来同志报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神种矛盾和不平衡情况之后，就制定了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和过大建设规模、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稳步前进的方针。10日，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提出的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在少奇同志的指示下，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发表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反冒进虽然后来受到指责，但在当时是正确的、必要的，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已经露头的“左”的倾向，也作为的“八大”的召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思想基础。

党的“八大”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又强调：工业建设的速度应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能搞得太快、搞得太猛，错了，还有回旋余地，过快了，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快点慢点是个方法问题，不是阶级立场问题。可惜，到1957年下半年以后，“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并没有能够继续贯彻执行，比冒进更冒进的“大跃进”发生了，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了一次严重挫折。

历史的经验值得回味。如果当时能仍像建国初期那样，集思广益，多采纳少奇同志的正确意见，多采纳周恩来、陈云和他的同志的正确意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里能够上好话，可以肯定，我们就会少一些失误，少走一些弯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按照这个总方针、总政策，我们既要搞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搞好对外开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者缺一不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要富强，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过去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并非是错在搞社会主义这一点上。就拿建国初期那些日子来说，党及时提出“一化”、“三改”的任务是正正确的，失误主要发生在过急、过快，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上。原定过渡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结果三年就完成；原定按“稳步前进的方针”先逐步发展初级社，结果搞高级社、人民公社化接踵而至，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经济建设上一再冒进，导致了“大跃进”的灾难。

在那段时间，少奇同志虽有某些片面性，比如为了强调某一个观点，常常有强调得过分的地方，但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是要把改造和建设置于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的。

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他建国初期的这些经济建设思想，经常不忘记我们确实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对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益的。至于有的人对我们过去的一些失误和走过的弯路说三道四，加以指责，甚至提出“补课”论，妄图把历史车轮往回拉，那就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愚不可及的了。正确的态度和办法应该是站在历史前进的立场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冷静的、科学的思索和探讨，从失误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样是历史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少奇同志辞世整整二十年了，人已去，但思想长存，风范永在。我谨以这篇文字，聊表对他的怀念之情。



1959年11月24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南阳兴隆农场视察。



1963年6月13日，刘少奇同志参观北京电子管厂。

“板蓝根大王”

1988年的初春，上海市爆发了严重的甲型肝炎，累计发病者达29万多人，市市郊不少人在抢购板蓝根干糖浆，全市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

要求调拨板蓝根干糖浆的电文像雪片似的飞到扬州市扬子江制药厂，疫情紧急，刻不容缓！

扬子江制药厂过去是江苏省泰兴县口岸镇一个制药小厂，从1978年就创制了板蓝根干糖浆。由于质量好、疗效高，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当时，全国生产板蓝根的药厂大批的。1981年四厂发生火灾时，从那里调拨了大量的板蓝根干糖浆，获得了“板蓝根大王”的雅号。

1988年初，扬子江有一个生产板蓝根干糖浆的车间，月产量有五万多包（每包十袋）。上海防治甲型肝炎所需要的板蓝根干糖浆，不是几万、几十万包，而是近四万包！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原料、人手、厂房、设备均不够，其难度之大，不是局外人能想象得到的。

扬子江制药厂的厂长徐镜人，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了党。五年部队的炉火，锤炼了他一副刚毅的性格。他的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四十来岁。他思维敏捷，敢于开拓，加上那一副漂亮的嗓门，颇有一点大将的风度。出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和厂里的干部研究，决定接受上海市的全部订货任务，再难再苦再累也要干！

他们一面从全厂调集熟练的工人、技师，恢复已停产的板蓝根车间，一面连夜派人到河南周口镇及南通市把筛药机、锅炉拉回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安装在车间里。真是闪电的速度！

正值新春佳节，口岸镇街上张灯结彩，四处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在团聚过年。扬子江从厂大到工人，想到上海的疫情扩大了，谁也不回家过节，日夜兼程地投入了紧张的制药劳动，终于在1988年1至4月间，生产出385万多包板蓝根干糖浆，及时地送到上海人民手中。尽管板蓝根对治疗甲型肝炎不一定有特殊疗效，但在当时紧急情况下，由于它对病毒有一定防治作用，人们还是争相购买，以致使板蓝根成为紧俏药品。可是，徐镜人并没有趁机哄抬药价，而是按照规定的价格，每包没有涨一厘钱，上海市的医药销售单位，多次来信感谢扬子江厂的奉献精神。

一个执著的美好的梦

扬子江制药厂从建厂以来，没有伸手向国家要过一分钱。1980年的产值是64.4万元，1988年的产值达1.2亿元，产值和利润连续八年翻八倍，人均创利万元以上。它不仅是泰兴县、扬州市崛起的企业工业中的佼佼者，在全省167家中西药厂中也名列前茅。

扬子江制药厂所以有今天，用徐镜人的话说来：“它是用所有职工的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时间回溯到1971年1月，口岸仪表厂成立了一个制药车间，这个畸形的胎儿，就是扬子江制药厂的前身了。这能算得上制药车间么？只有六间房子、两个大水缸、十几个经过培训的工人。生产百尔定、百乃定两种制剂，用水量很大，可他们连水塔也没有。车间的负责人徐镜人



扬子江的正气歌

陈 模

就和工人一起，每天轮流到半里外的小河去挑水。制药一天用二十缸水，二十担水才能装满一缸。两个人一班去挑水，也得八九个小时！

厂房太小，施展不开。徐镜人又找到一块荒地，领着大家挖土、平整、填墙、挑砖、盖厂房。资金短缺，他不得不四处借款。为了节省出差费，职工们到县城去办事，就花七角钱租一辆自行车，还要选有支架的，好多载一个工人。回来把汗湿的衣服一脱，马上进车间干起来。

1971年9月，两种制剂试制成功后，工人们眼望着灾情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们的第一炮响了！”

这一年的销售颇见不大，毕竟迈过了艰难的第一步。制药车间被镇政府批准为工农制药厂。这时候职工的工资，最低的元，厂长徐镜人也只有23.5元。每天加班加点，谁都没有要过加班费，也没有一点怨言。大家从实干和创造中，发现了自己的特殊价值，现在能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人民治病造福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这是扬子江人的梦，一个执著的美好的梦！

祸从天降

1985年4月间，为了迎接《国家药品管理法》的实施及“三证”（即生产、营业、卫生三证）的颁发，厂里成立以徐厂长为首的企业的整顿领导小组和企业整顿办公室，对生产、经营、质量、卫生、工人、厂房等九个方面进行严格的整顿。6月间，经省、市、县三级“三证”检查验收组检查确认合格，人们似乎可以喘一口气了。

谁知祸从天降！

验收组离厂没有多久，国内有几家报纸发出了一则有关他们厂的消息：“泰兴县制药厂口岸分厂向上海大量销售劣药！”有些医药报纸、杂志也纷纷予以转载。人们都为不久前发生的晋江假药事件吓坏了，现在又出一桩生产劣药事件！

口岸制药分厂立刻被蒙上一层可怕的阴影，退货电话与退货合同，不断地向厂里涌来。发出的货款都被封存，资金不能回笼，全厂被迫停产三个月，经济损失达到700万元。

口岸制药分厂受到严峻的考验！徐镜人忧心忡忡！他仿佛觉得有人冷不丁重重地打了他一闷棍。他实在不解：怎么会发生这种颠倒黑白、诬陷他人的事情呢？啊，他渐渐地了解到，这一则无中生有、纯属流言的“消息”，是根据某个行政单位收到的一封未经核实的“人民来信”，和某市医药经销单位在竞争的形势下，出于排挤外地药品的需要而编造的不实之词撰写的。他通过各种渠道，请求上级领导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8月间，泰兴县、扬州市、江苏省药政部门联合调查组进了厂。紧接着，国家医药总局和

省、市、县经销药品部门也派人来了。他们查阅了口岸制药厂两年来的发货、单据和生产记录，抽查了250个成药批号的留样，确认该厂所有的产品质量都是合格的。

这一封“人民来信”，使一个新兴企业受到700万元的损失，还花费了20多个干部大半个月宝贵的时间，但诬蔑诬陷澄清了。

徐镜人和厂部的同志，并没有因此轻松起来。他们在致力于恢复工厂元气的时候，从“劣药”风波中吸取教训，在职工中开展了深入的产品质量意识教育，制订了超过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的内控标准，加强了产品质量的管理和检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时被人指责为“劣药”的板蓝根干糖浆，10月间在全省同类产品的评比中荣获第一名。

11月间，扬州市计委批准泰兴制药厂口岸分厂改名为“扬州市扬子江制药厂”。从此，扬子江制药厂的旗帜，在长江之滨高高地飘扬起来了。

新生命的交响曲

1988年的一个秋夜之夜，徐厂长的办公室，内闪烁着不灭的灯光。他不住地吸着烟，陷入了沉思中。烟缕变成了迷雾，在室内徐徐地升降。

在双增双节运动中，国家紧缩银根，压缩经济过热的现象。面对着市场不旺、厂外欠债太多、原材料涨价，“扬子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作为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徐镜人，厂里内的重要问题，他是能够掂了掂的。现在，他对自己设想的改革方案，也犹豫起来了。增产、翻番的计划不现实，可能得；他把另外四级厂级干部叫来了，这是他能得到的战友，他们交谈着、争辩着、探索着，直到黎明。

深化改革的方案终于定下来了。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毅力，作出了许多机智大胆的决策。

市场上总有畅销、平销、滞销的产品，扬子江厂也不例外。让产品满铺开路的方针吧！我们就是要靠自己获奖的优质、名牌产品，才能批量地投放市场；同时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地开发新产品。

徐镜人亲自抓销售工作，使企业由生产型转向经营型。原来全厂销售人员只有13人，他从全厂调来精兵强将，逐步扩大到30—50人，建立了广西藏外的全国销售网络。坚持“用户至上，讲究信誉，方便服务，保证质量”的宗旨，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要送货上门。

他还在企业内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科室人员由100多人压缩为60多人；把年轻有为有威信的人，提拔到生产领导岗位上；在车间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使每个职工各尽所能，多劳多得。

为了保持企业的后劲，增强本厂产品的竞

争力，成立了扬子江医药化工集团公司，与北京、南明的多家医药科研单位及化工、塑料厂等，建立巩固的合作关系。

以往每年厂内的基建投资，都在三四百万元，现在除零星建设外，基建项目都下马了。

有了恰当的经济措施，还要有党的思想工作作保证。这里的党、团、工会组织，经常对职工进行“坚韧不拔，锐意进取，团结协作，永不满足”的企业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遵守法纪的教育，每个党员干部都联系一定数量的工人，协助车间做好思想工作。近十年来，厂里没有一个工人违法乱纪。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全厂去年的产值突破1亿元的大关，利润1332万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5000万元，回笼货款4000万元。扬子江人迎着困难上，谱写了企业新生命的交响曲。

堂堂正正地做人

1986年4月间，国家医药总局的六个干部，来扬子江厂检查药品质量。一天深夜两点多种，他们步行到各个车间去看了看。他们吃过了，信服了，回来对人说：“车间里每个工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生产秩序很好。没有一个人打瞌睡，那天，我们走了全国许多制药厂，像这样的厂子还少见！”

郭友明是部队转业汽车驾驶员。来扬子江开车以后，一贯勤勤恳恳地工作，后来当了汽车队长。有一次他驾驶“130”车到南京送药品时，便在行驶道上的辆“江淮”大卡车，突如其来地向他快速撞了上来个急拐弯。如“130”向右急转弯，他就会撞在公路的交通岗亭上，把同车的吴撞死，绝对不这样做！他立即将车向左拐急转弯，“江淮”的尾巴撞着“130”，他的肝部被挤碎。吴要他把车撞死，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用颤抖的声音说：“小吴，我行了……你不要管我……车上有厂里的通行证，你快打电话向厂上汇报！”小吴流着泪把队长送到医院，他刚上手就断了气。

这不幸的消息传到厂内，徐厂长忍不落泪哭起来。好多同事难过地哭了。党支部书记郭友明为优秀党员，全厂开展了学习郭友明的活动。郭友明在全厂职工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公而忘私、品德高尚的人！

像郭友明这样默默地为厂工作的人，实在难以数计。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凝聚力，把人们难上进的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我访问过许多厂元老、青年工人和科室人员，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我们厂干部好，我们信得过！”徐厂长从来于下以后，就住在厂里，吃在厂里，除了吃饭和夜里睡五六小时觉，其余时间全用来工作。其他干部也跟他学，常工作到夜深。他们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真是操碎了心。他们的心里装着全厂的职工。在徐厂长的提议、热心支持下，一幢职工宿舍楼盖起来了，不少科技人员的“两地分居”的问题得到解决，每个工

午餐可以享受五角钱的营养补助费，十多位勤学的青年，被保送到药学院或他大学去学习了。

人们说：扬子江的士气正！

徐镜人是口岸镇人，他在镇上的亲戚朋友太多了。扬子江厂越来越好，求他安排自己子女进厂的人也多了。徐镜人说：“我现在不好给你答复。厂子招收职工时，你们来厂报名应考好了。”够条件的考上了，不合格的什么也不取。这样，全厂职工的文化、品德、身体素质都比较好。没有考进厂的，难免要骂徐镜人“无情无义”。过久了，骂的人也知道，这是扬子江的招工制度，连徐厂长自己也不好违反的。

在扬子江工厂的橱窗里，有徐镜人的大幅照片：清廉。这是他为人的守则，对职工也是这样要求的：人人要爱惜工厂的一切财物，绝不允许假公济私的现象发生。他还规定不许接受礼物和变相的“回扣”，销售员不能请客送礼。推销药品产品质量，靠正规的渠道（各地医药公司二级批发站），靠自己的信用、友情和周到的服务。多年来，这里不断有人拒收贿赂、小费，没有发生贪污、收受贿赂现象。在社会上蔓延着不正之风的今天，这样堂堂正正地做人是难能可贵的，这成为扬子江人精神的一个亮点。是“己不正，焉能正人！”如果徐镜人不严于律己，他无权要求别人的。

俗话说：“树大招风”。扬子江制药厂办大了，徐镜人在制界出了名，有了业绩，难免不遭到别人的误解、非议和嫉妒。比较多的说法是：徐镜人骄傲。平时，他连普通工人的意见和意见，都很认真地听取，还多次带干部到苏南和本县一些先进单位去取经。他说：“办厂的压力很大，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即使想骄傲也难啊！”只是来厂访问、办事的人很多，他的工作过忙，照顾不到的情形是有的。

一天，徐镜人的老同学奚盛问他说：“老徐，你到别国干啥？何必自己搞得这么苦呢？”徐镜人眨眨眼一眯，笑了笑说：“图啥？要办好这么个大学子，还不够我忙的？我个人损失点，豁出来，又算得了什么？”徐镜人的一位朋友，曾写了两句诗送给他：“不遭天降非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徐镜人沉思了一下，说：“我不愿意当庸才。”只是想做一个堂堂正正有作为的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

扬州市医药公司的副经理郝同志，听说我要来写扬子江的文章，主动来找我谈了半天，他说：“我是看着扬子江发展起来的人。像扬子江这样的好企业，像徐镜人这种开拓进取的企业家，在我们地区不是很多的。全国能有1/3的企业这样做，我们的四化建设就很顺利了。”

扬州市内有座著名的古迹文丞相祠。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扬州抗元的壮烈业绩，他在狱中所写的充满爱国精神的《正气歌》，一直激励着人们在艰难面前不屈服、奋勇地去创造新的生活。“是气所磅礴，凜凜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扬子江人”不畏挫折，不怕厄运，不怕险恶，从一个只有几间平房、两个水缸的车间，建成了千人员工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企业，谱写了一曲我们时代的正气歌。

敬礼，艰苦创业的“扬子江人”！



首都产业报界向社会各界致意
欢迎订阅 1990 年各产业报、专业报，并欢迎刊登广告

中国科学报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4 邮发代号：1—42 定价：年价 18.44 元 邮政编码：100084 地址：北京三里河路 52 号 电话：866293	中国劳动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22 邮发代号：1—108 定价：每份 0.18 元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和平里西街 5 号 电话：4215702	中国地质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41 邮发代号：1—22 国内外代号：D860 定价：年价 15.60 元 邮政编码：100012 地址：北京西四内大街 64 号 电话：65-3959 65-8561 电挂 418	中国电力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6 邮发代号：1—52 定价：年价 18.72 元 邮政编码：100071 地址：北京 1415 路白广路二条一号 电话：36-5831 转 4461	中国煤炭报 主办单位：中国煤炭工业总公司 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 中国地方煤炭联合开发公司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8 邮发代号：1—53 定价：年价 24.96 元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安外和平里北街 21 号 电话：中电线：44-6671 电挂：6066	中国石油报 主办单位：中国石化天然气总公司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7 邮发代号：1—78 定价：年价 6.30 元 邮政编码：100074 地址：北京安外和平里北街 21 号 电话：201-5544 转 3714 或 2481	人民铁道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刊期：周三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6 邮发代号：1—59 定价：年价 28.08 元 邮政编码：100058 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北蜂窝三三号 电话：306-1868 44359(路电) 86-724
中国机电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刊期：周四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58 邮发代号：1—34 定价：年价 37.44 元 邮政编码：100083 地址：北京月坛南路 26 号（社址） 北京百万庄爱菊园（编辑室） 电话：802-3309 802-3305	中国电子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刊期：周三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5 邮发代号：1—108 定价：每份 0.18 元 邮政编码：100020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6 邮发代号：1—145 每份定价 0.20 元 邮政编码：100043 地址：北京和平里西街 5 号 电话：87-4031 电挂 652	中国农机化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1 邮发代号：1—37 定价：年价 5.10 元 邮政编码：100025 地址：北京 86814 863380 电挂：7658	中国航空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5 邮发代号：1—144 定价：年价 3.36 元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 1415 路白广路二条一号 电话：4221689-8370900	冶金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 刊期：周三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9 邮发代号：1—97 定价：年价 21.00 元 邮政编码：100014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 3 区 26 号楼 电话：4221655 电挂：3131	中国有色金属报 主办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15 邮发代号：1—101 国外由报社直寄 定价：年价 6.80 元 邮政编码：100014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乙 12 号 电话：801-4477 801-6358	中国化工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4 邮发代号：1—51 定价：年价 7.68 元 邮政编码：100073 地址：北京百万庄北蜂窝 电话：201-3959 201-3957
中国石化报 主办单位：中国石化总公司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41 邮发代号：1—135 定价：年价 8.84 元 邮政编码：100020 地址：北京安定门外小关街 24 号 电话：421-6731—351 电挂：04-0029	消费时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57 邮发代号：1—81 定价：年价 31.20 元 邮政编码：100020 地址：北京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 8 号 电话：500-4516	中国食品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6 邮发代号：1—31 定价：年价 21.00 元 邮政编码：100055 地址：北京市广安门内大街 312 号 电话：306224—312	中国纺织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7 邮发代号：1—112 定价：年价 21.00 元 邮政编码：100054 地址：北京安外和平里北街 2 号 电话：612-9152	人民日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16 邮发代号：1—137 定价：年价 9.48 元 邮政编码：100011 地址：北京安定门外大街 181 号 电话：4222641	中国水利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56 邮发代号：1—137 定价：年价 4.82 元 邮政编码：100011 地址：北京宣武门内大街二条五号 电话：365331	中国农牧渔业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0 邮发代号：1—131 定价：年价 5.80 元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二条五号 电话：4215918 电挂：3346
中国乡镇企业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刊期：周三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6 邮发代号：1—36 定价：年价 31.20 元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二条五号 电话：4214569-4223670 电挂：3214	中国商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 刊期：周二刊（每周二、四、六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8 邮发代号：1—81 定价：每份 0.15 元 邮政编码：100053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内大街 155 号 电话：301-4827 301-4829 电挂：北京 1977	国际商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 刊期：周三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18 邮发代号：1—30 国外外代号：D790 定价：季价 7.00 元 邮政编码：100016 地址：北京西四环路 18 号 电话：801-5621	中国物资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物资部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32 邮发代号：1—53 定价：年价 19.44 元 邮政编码：100026 地址：北京月坛南路 25 号 电话：830-2795	中国统计信息报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23 邮发代号：1—135 定价：年价 7.80 元 邮政编码：100026 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路 38 号 电话：8012233	中国建材报 主办单位：国家建材局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73 邮发代号：1—125 定价：年价 18.72 元 邮政编码：100011 地址：北京市百万庄 电话：831-5392 831-7369	中国民航报 主办单位：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94 邮发代号：1—97 定价：年价 5 元 邮政编码：100010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155 号 电话：401-2333 转 8504、8502 电挂：22101
中国医药报 主办单位：国家医药管理局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40 邮发代号：1—127 定价：年价 18.96 元 邮政编码：100054 地址：北京市陶然亭路甲 8 号 电话：338165	中国气象报 主办单位：国家气象局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58 邮发代号：1—149 定价：年价 4.50 元 邮政编码：10005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 46 号 电话：831-2277—2752	中国海洋报 主办单位：国家海洋局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1 邮发代号：1—149 定价：年价 8.40 元 邮政编码：100026 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一号 电话：868941—517 电挂：3189	中国外贸报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5 邮发代号：1—110 定价：年价 5.70 元 邮政编码：10001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西路 5 号 电话：48-1385 48-1381	首都经济信息报 主办单位：北京市计划委员会 刊期：周一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04 邮发代号：1—110 定价：年价 5.70 元 邮政编码：10001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西路 5 号 电话：701-2365 电挂：北京 3335	中国包装报 主办单位：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中国包装总公司 刊期：周二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46 邮发代号：1—97 定价：年价 4.68 元 邮政编码：100010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大方 电话：512-8568 55-2602 电挂：8787	各报均可承接广告 业务并愿为社会各界提供多方面的服务